超越四十二个学科

——关于跨学科问题的思考

[美]杰伊·迈克丹尼尔

认真考察世界上的任何一所大学，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教师都是按学科不同而分类，并被安排在相应的院系大楼或院系大楼的各个部分工作。

大学为什么如此？原因可能在于这样的分类可以更有利于教师完成共同的任务，同时也有利于教师和学生为知识的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有些人甚至认为，自己所从事的学科比其他学科更有价值，因为自己所在的学科比起其他学科有更多的真实性或具有更多的实用价值。例如，有些自然科学家相信，生物学、物理学和化学比音乐或戏剧艺术提供了更多的真理；有些经济学家和工程师认为他们的学科比哲学或博物馆研究更具实用价值。

分析这些观点产生的原因，我们不难看出，那是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有了一个关于善的社会的理解，也就是一种关于“什么是善的社会”的自我先在假设，当然这些观点也可能源于他人的观点，但通常这类假设缺乏哲学层次上的思考。例如，他们可能会认为一个善的社会应该是经济繁荣的、人人平等的、精神愉悦的、尊重个人权利的。但通常情况下，这些假设是不符合时代实际的，除非他们在哲学方面足够专业。

42个学科

到底有多少不同学科？如果打开维基百科，你会发现，至少有42个。为了考察这些不同学科，很有必要对此进行列举：历史语言学，文学，表演艺术，哲学，宗教，视觉艺术，人类学，考古学，区域研究，文化和种族研究，经济学，性别和性研究，地理，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空间科学，地球科学，生命科学（生物），化学，物理，计算机科学，逻辑，数学，统计学，系统科学，农业，建筑和设计科学，神学，教育，工程，环境研究和林业科学，家庭和消费心理科学，保健科学，体育学和新闻学，媒体技术，通信技术，法律，图书馆学和博物馆学，军事科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工作和运输。通常维基百科把这42个学科分为五大领域：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形式科学，专业和应用科学。

STEM学科的崛起

对这42个学科，以下3个方面的观察和分析必须迅速展开。

第一，并不是所有的大学可以拥有所有这些学科。考虑到财务和行政方面的原因，一所大学必须就哪些学科可以而且应该作为其学科代表作出决定。

第二，42个学科会产生不同类别的知识：对这些学科的研究是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它们是理论学科还是应用学科？因为有人认为一些学科，比如神学，并没有真正产生任何知识。

第三，几乎每个人都坚持本学科对社会整体的重要性。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时代，人们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比人文科学更重要，至少那些为教育提供资金的政府官员和决策者是这样认为的。

更具体地说，在世界各地，人们都在强调的STEM学科——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比其他学科更重要。与STEM学科的兴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文学科的贬值。通俗地说，如果没有更高的权威，这样一种科学阶梯排列已经深入许多人的头脑，即自然科学和数学在顶部，社会科学在中间，人文科学则在底部。

为什么梯子顶部是自然科学和数学？自然科学和数学之所以被认为重要，原因不只是因为它们产生的知识，还因为它们可以以非常实用的方式在技术和工程领域中应用。因此STEM学科才会崛起。确实，与其他学科相比，这些学科对生产性知识的提升有很大的作用。

八种类型的知识

何谓生产性知识？一般来说，生产性知识就是有助于个人和社会福祉的知识。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从学科中产生的知识都是具备生产力的。但是，为学科排序的人关注更为具体的东西。他们认为生产性知识有三个特性：(1)它是定量研究而不是定性研究；(2)它是实证而不是理论，以及(3)它可以帮助人们获得就业机会，进行经济生产任务，并有助于一个社会的经济繁荣。

哲学家和其他学者认为如果这样定义生产性知识，就等于把知识范围限制到一个非常狭小的生活领域。事实上，过程哲学家和其他学者建议：(1)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同样重要；(2)就实证而言，许多形式和种类的经验都是实证性的，例如超然的感觉就是其中之一；(3)对生产性知识应该有多种理解，是生产力的服务给世界一个满意的生活。

哈佛大学霍华德·加德纳定义了八种形式的生产性知识：口头语言，数学逻辑，视觉空间，音乐节奏，身体动觉，自然，内省（自我意识）和人际交往（移情）。他认为，所有八种都具有重要性，它使人能够作为一个完整的人，而社会应该给予他们平等的考量。尽管如此，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口头语言和数学逻辑比其他学科更为优先的时代，不仅仅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也包括中国。我们把这种优先级视作为西方现代化的遗产。在这样一个迷恋STEM学科的时代去挽救其他认识途径是艰辛的。因此，我们发现两个颇具希望的运动其重要性在现代大学中似乎正在上升：学科交叉与跨学科。

学科交叉与跨学科

这两个词，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定义。学科交叉是通常用来描述一个具体领域中，来自不同学科的人研究同一个主题——例如可持续发展社区——并且带来他们各自学科对这一主题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当他们接近这一主题时，他们会意识到他们有很多可以向其他学科学习的东西，并且作为一个整体的主题，不能在没有其他学科智慧的情况下被成功地理解和学习。在理解可持续发展社区时，例如，有些知识需要从生物学家那里获得，但也可能来自于人类学家、经济学家或哲学家。当他们研究这个主题的时候，某种创造性的转变发生在他们的思想中。他们谦卑地放下了自己学科的优越感并开始向其他人学习。

跨学科则更进了一步。它带来的是对多种认知方式的欣赏和一种跳出学科本身的限定性因素而进行思考的渴望。跨学科具有一种超越交叉学科的自由与新鲜感。它不像那种学科之间单纯的结合，而更像一种爵士音乐会，每一个人可以在演奏自己的乐器的同时尝试其他新的不同声音。

我们认为，知识碎片化的时代现在正在为其付出代价，社会和学术界都需要探索更具想象力的世界认知模式。我们已经受到如下现象启发：科学家求助于音乐以获得灵感，神学家求助于艺术以获取灵感，经济学家求助于人类学以获取灵感。我们赞成通过一种学科边界的结合来进行大胆和创新的思考。

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一方面来说，是为了知识理解本身。如果现实是一个整体，是相互关联的，那么现在理解就不是通过创建事先不存在的联系，而是通过意识到始终存在的但却被过度强调的学科界限所遮蔽的联系进行的。另一方面，我们有更实际的理由赞赏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的思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高度二分法，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谬论。在解决人与生态福祉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的思维找到了他们的根据和归宿。诗人和工程师，哲学家和音乐家可以在一起努力工作，构建并实现具有参与性、创造性、富有同情心、公平、生态智慧的人类生活居住模式。在中国，这些生活居住模式是政府建设生态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和表现。交叉学科和跨学科思维的未来不仅在于探索认知现实的不寻常的方法的乐趣，更在于建设生态文明的创造性劳动。没有一种学科可以垄断这一切。STEM学科虽然扮演着主角，但哲学和神学，音乐和戏剧艺术，文化和农业的角色同样很重要。为了朝这个方向发展，强调学科独立界限的观点本身必须受到批判。这不是为了反叛，而是为了真正的智慧。仅仅进行知识储备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一个智慧不断喷发的源泉。

（作者杰伊·迈克丹尼尔，美国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美国国际生态文明联盟主任，全美优秀教师。已出版《何谓过程思想》《根与翅膀》《居住边缘——消费主义批判》《甘地的希望》等著作多部。译者吴伟赋，浙江广播电视大学文法学院院长）

社会认同的生

□ 许静波

社会认同是文化多元化时代哲学的研究主题之一，它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区域认同、集体认同、身份认同的集合形式，其中至少包含两个基本的要素：一是群体性的精神纽带，即同一性方面；二是作为对立面的“他者”，即差异性方面。人们在社会和日常生活中不断思考着未来的行动，反复评估自我与他人的性格、情感、反应，并试图理解和说明它们，而作为讨论、反思、证明和考察的结果就是社会认同，简言之，就是对具体问题一致的认识。例如，人们对正义和宽容，以及对其重要性的认识，有着全球性的令人惊奇的一致性，这就是一种社会认同。

社会认同中的“社会”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场所，它同时还具有时间性，因而，社会认同的生成是长时段的，潜移默化的和具有历史继承性的。现代社会认同与前现代相比有很大不同。举例来说，在前现代社会中，信任和安全意识根植于亲缘关系、地域群体、宗教信仰以及延续着的世俗传统之中，而现代性的强大动力机制使血亲和地域不再是认同的主要依据，曾经从时间和空间上划分的群落已经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屈从于资本的逻辑。随着全球化带来的文化交融，社会认同原有的确定性和基础不断被削弱，社会认同的连续性也不断被瓦解，人们在社会大转型中经历的思想动荡又使社会认同不断淡化，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化生成新的社会认同。由此可知，社会认同在其内涵上，虽然与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存在相似之处，但社会认同并非被动地接受一系列固定的或特定的信念和习俗，它一定与当下的社会条件，尤其是政治环境紧密契合，因而又是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统一。这实质上是一种精神再生产的机制，它通过塑造特定的“社会记忆”，进而塑造特定的社会认同。

那么，社会认同是怎样生成的呢？社会认同的生成必须以个体为基础，以个体的理解和认识为前提。个体的生活经历会集结为一种稳定的心理倾向，随着生活经验和阅历的丰富，个体之间就某些具体社会问题的认识会形成交集，并经反复实践后强化为集体记忆。例如，个体在生活过程中遇到的教育、医疗、就业、分配等具体问题，及其产生、发展的深层原因，会随着实践的深入在个体之间形成一致性的认识或集体记忆，人们会在一段时间内按照这种认识来指导生活。社会认同就是对集体记忆进行反复选择的过程，同时，社会生活中的个体又是通过选择后的集体记忆为背景来认识自我和社会。实质上，社会认同是建构意义的过程，是对良善生活的价值诉求，作为社会意义系统的制度、体制和道德准则若要被民众认同就必须借助个体的生活条件。社会认同的背后隐藏着个体的生活经验，只有通过个体的，因而也是“主观的”共鸣，社会秩序才是可以理解的。个体往往终其一生去践行某种认同，以求缔造动态的，而且是具有统一性的完整的生命过程。当然，个体认同在上升到社会认同的过程中，既具有一致性的认同倾向，又具有差异性倾向，即某一特定群体中的个体在认知和情感上对自我乃至所属的群体身份不承认，由此产生心理上的疏离感、被剥夺感和自卑感，但是，个体仍应自觉地“矫正”到社会认同中去实现自我。可见，认同是在个体之间互动的过程中生成的，它不是预先给定的，也不可能完全以自我利益为中心，而是受到共同规则的制约和导引。生成社会认同需要通过时间，通过历史事件来组合一幅[illegible]认[illegible]当[illegible]像[illegible]它却不可能[illegible]言观，而只能以心理形式被感知和确认。

社会认同需要拥有更深层的人类共鸣的环境，只能凭借探讨人类共同面临的困境，探讨作为道德根源的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才能被阐明。社会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和多样化、司法权威的弱化倾向、社会冲突的群体化趋势都会不同程度地降低社会认同度。鉴于此，我们需要更新引起个体共鸣的语言，需要强化政治主流话语的影响力和说服力。因此，社会认同在当代也是被塑造的，塑造社会认同是一个微妙的长期过程，现代传媒在社会认同的重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现代媒体含蓄地塑造特定版本的群体记忆，从而塑造特定的社会认同，在当代，它是社会认同得以形成和持续的主要外部条件。社会认同最为直接、关键和必经的环节是社会公共领域，其途径是公共语言。公共语言经由强大的现代传媒输入到个体的心理层面，以祛除偏见和刻板印象，使社会认同内化为个体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内化为对某种意义的期待和效仿，内化为个体评价、判断和选择的标准。

当然，现代社会认同也具有消极的一面，如社会认同中包含了实现自我与肯定他者之间的两难选择，这种存在方式会表现为个体的焦虑心理；受宗教、道德、国家、政治、习俗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对于特定的个体或群体而言，可能存在程度不同的多重认同，在面对多元化时，个体往往固守某种价值观，因此表现为自闭心理。然而，社会认同的消极方面在当前是不可避免的，这只能在个体的积极实践与环境改变的互动中渐次消解。

（作者单位：东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者论坛

气候变化议题的社会复杂性

□ 洪大用

气候变化无疑是当今时代热议的话题之一，尤其是在科学圈、媒体圈和政治圈中。一些自然科学证据似乎表明气候变化已经是可以观测到的客观事实，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极端气候事件，往往也被认为是气候变化的重要证据，而人类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向大气层排放太多的温室气体被认为是导致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由此，问题似乎很清晰，理应得到解决，而且有了解决问题的方向。

但是，另一方面，全球各国关于气候变化的谈判长期进展迟缓，有关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立法和制度安排仍然不足，而公众自觉的行为调整更是非常有限，“一切照旧”“到时再说”倒是比较普遍的心态。由此，气候变化的严峻性与社会反应的滞后性又形成了鲜明反差。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就此提出了广为人知的“吉登斯悖论”：“全球变暖带来的危险尽管看起来很可怕，但它们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可见的，因此许多人会袖手旁观，不会对它们有任何实际的举动。然而，坐等它们变得有形，变得严重，那时再去临时抱佛脚，定然是太迟了”。

最新权威的跨国社会调查（即国际社会调查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分别简称ISSP和CGSS，于2010年完成）数据，部分地证明了吉登斯的上述判断：在全球31个调查国家中，面对空气污染等各种环境问题，只有13.8%的受访者选择“气候变化”是其本国面临的最重要的环境问题，而在调查列举的包括环境问题在内的各种社会问题中，受访者最为关注的是医疗保健、经济、教育等问题，环境问题仅排在第六位；受访者选择“气候变化”作为“对个人和家庭影响最大的环境问题”的比例只有11.2%，位列第四，前三位依次是空气污染、生活垃圾处理和水污染；受访者表示为了环保而“总是”和“经常”减少开车的人只占16.3%，自觉减少居家能源消耗的只占41.2%。特别是高收入国家受访者，相对于其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较高关注而言，其自觉减少开车的行为是不太相称的，超过3成的人表示从不为了环保而减少开车。

然而，进一步分析所谓“吉登斯悖论”，我们似乎可以指出其暗含了3个基本预设：一是确认气候变化问题的真实性；二是假定有形、严重的环境问题会导致社会成员普遍共识；三是基于有形、严重的环境问题而形成的社会共识将导致实际的应对行动。笔者认为，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吉登斯的观点中所隐含的这些预设，在很大程度上是违背其所属学科之视角的。社会学是对社会系统和人类行为进行综合性、整体性研究的一门社会科学，社会现象背后的本质规律性是社会学探究的主要对象。从社会学的视角考察气候变化，并非是关注气候变化的自然事实，而是要将对气候变化的关注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分析，关注气候变化议题的社会复杂性。

如此一来，基于社会学的学科视角，它首先并不简单地假定气候变化问题的真实性，而是关心谁在说、如何说以及为什么说“气候变化”，也就是对气候变化议题建构的社会过程进行分析。社会学研究表明，气候变化知识生产存在不确定性。尽管气候变化本身是基于一些科学观察的数据和资料而提出的，但是，这一科学事实的确定必然是科学家之间沟通、协商和争议的结果。而科学家的生活和工作背景都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他们对数据和资料的理解以及得出最后结论。同时，科学家也分别受雇于学术机构、政府机关、工业和私人环境组织等，这些组织都提供了不同的研究日程和政治气候，由此影响到科学家的研究行为。更为重要的是，气候变化从科学家的观察研究结果到进入公众视野，演化为社会议题，其本身就是社会各个主体参与建构的过程，这当中大众传媒、教育机构、企业、民间组织以及特定的社会政治过程都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研究目标正是描述气候变化议题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一种可能影响社会进程和人类行为的“社会事实”，以及这样一种“社会事实”是如何形成的。作为社会学者，在其研究过程中，气候变化的自然属性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尽管作为社会成员，社会学者可以选择相信或者不相信气候变化的价值判断。

其次，假定气候变化在自然科学的意义上是一种有形的、严重的环境问题，社会学也并不认为其会必然地导致社会成员形成普遍共识。事实上，在作为自然现象的气候变化与作为社会现象的社会认知之间，存在着种种过滤的“棱镜”，这些棱镜就是社会成员直接面对的差异化的资源环境禀赋、文化与制度安排、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社会发展模式以及社会地位结构等。经由这些“棱镜”的过滤，即使是很纯粹的气候变化问题，其所激起的社会反应也必然是差异化的。不同国家、地区和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成员，都有其理解气候变化原因、责任与应对策略的特定角度和立场。在社会学意义上，这种差异化的社会反应是客观合理的。社会学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探索对气候变化之差异化反应的具体社会原因和机制，以便为尊重差别的气候政策提供参考，而非简单地呼吁形成应对气候变化的所谓共识。实际上，除非消除社会成员之间的各种社会差异，就不应盲目期待某种普遍的、一致性的所谓共识。而无视气候变化反应的差异性及其复杂的社会原因，企图将气候变化的“共识”强加给所有社会成员，这样的气候政策注定是要失败的。

再次，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即使基于气候变化的严峻性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共识，也并不必然地导致实际的应对行动。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戒烟。现有很多证据表明，吸烟有害身体健康，很多人也都同意这一点，但是有的人戒烟了，有的人继续抽烟。前述权威调查数据也表明，调查各国有高达85.0%的受访者认为气候变化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有害，而且中等收入国家公众对危害性的感知更为强烈，认为气候变暖“极其有害”的受访者比例达到33.7%，明显高出高收入国家（22.4%）。就此数据而言，应该说各国公众对气候变化的危害已经有很充分的认识了。事实上，面对着可能威胁到整个人类生存安全的气候变化问题，绝大多数人都会表示这样那样的关心。但是，在人的认识和实际行动之间存在着具体行动情境、价值优先序列以及相机决策等因素的影响，不同的社会行动者所处的行动情境不同、价值优先序列以及相机决策偏好不同，都会导致不同的行为反应。社会学研究的第三个重要目标则是对这些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例如，已有研究表明：一些社会成员面临着并非由于气候变化所导致的生存发展的眼前压力，他们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为调整也就只能“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而在行为抉择方面搭便车的选择偏好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在此毋庸赘述。

综上所述，气候变化在成为一项社会议题并要求社会成员作出行为应对方面，具有相当的复杂性，简单地使用所谓“吉登斯悖论”概念无助于深入地描述和解释这种复杂性。只有反思并采用真正的社会学学科视角，深入研究气候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以及如何成为一种新的“社会事实”，充分认识并理解气候变化之社会反应的差异性，更加关注广泛、有效的信息传播和沟通协商，更加重视制定合理的政策组合，消除社会不平等等社会差别，以凝聚全球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合力，如此才有可能深入揭示气候变化的社会复杂性，并为气候变化研究和气候政策制定作出来自社会学学科的特别贡献。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

论点摘编

精神生活发展的现实处境及其超越

廖小琴在《贵州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撰文指出，资本、科学技术和精神文化是当代社会推动人的精神生活发展的三大实践动力。在经济全球化、社会现代化、文化多元化的交汇作用下，这些支撑力量与人的关系方式发生了变异，人的精神生活发展陷入资本逻辑操纵下的物化处境、科学技术利用下的异化处境和文化工业影响下的庸俗化处境。但处境的危险性同时也蕴含着人的精神生活质量提升和超越的可能性。当代人只有选择以精神生活发展为主导的，力求超越现实存在的创造性的生存方式，树立全面的价值取向，坚持各种价值的全面与协调，并充满高度的文化自信，才能实现物与人、人与社会的良好互动，进而实现人的精神生活的自觉自由发展。

元伦理学是什么

元伦理学是以伦理学自身作为研究对象的一种反思性、批判性研究。它要求在更广阔的视野中，在更高的层次上，反思、追问伦理学自身的根本性前提与可能性基础，分析和探究对象理论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审查和检验对象理论的合理性、有效性。有鉴于此，《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刊发一组文章对此展开研讨。**江畅**指出，深入研究元伦理学，首先需要对理查德·罗森提出的“元伦理学难题”作出回答，即：道德术语或道德判断的意义是什么？道德判断的本性或性质是什么？道德判断如何可能得到支持或辩护？他认为，道德语言的意义在于评价和规范，道德评价语言表达善恶，道德规范语言则表达正当不正当。存在着各自适用范围不同的两类道德标准，即道德价值判断及道德价值标准和道德规范判断及道德规范标准。基本道德标准的终极依据是社会根本的和总体的利益。**孙伟平**对普特兰的“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崩溃”作出评析，并指出普特兰对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扬弃，宣告了非认知主义的“垮台”和新自然主义（描述主义）的强势回归，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代西方伦理学的主流立场。**林季杉、戴茂堂**以西方伦理学为例，论证了伦理学的超科学性，他们认为，伦理学不是自然科学，因而也不可能以自然科学的原理、方法来把握。道德公理既不能经验证实，也不能逻辑证明。科学理性说明不了道德的行为，不能最终解决伦理问题，相反，科学对道德的承诺也很容易变成对道德的暗中消解。